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影响因素： 来自福建泉州的证据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ports Industry Polic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Fujian Province

杨京钟¹, 吕庆华², 易剑东³, 朱 苗²

YANG Jing-zhong¹, LV Qing-hua², YI Jian-dong³, ZHU Miao²

摘要:为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通过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有效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有显著影响。依据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性提出提升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影响因素;实证

Abstract: For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of China's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influence, this paper put forwards that research hypothesis should be based data model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 shows that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policy effectiveness and sporting goods enterpris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sports industry policy efficiency. Based on key factors of sports industry policy efficiency analysis, suggestions targeting to promote sports industry policy efficiency are put forwarded.

Key words: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policy efficiency; influencing factor; empirical*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不高,存在产业政策缺位、错位、越位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国家各种政策引导下充分发挥体育用品产业的主导作用,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在生存与市场竞争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较晚,学术成果鲜见,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以产业政策制定影响因素研究为着力点。荷兰经济政策学家丁伯根分析了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对政策倾向的影响,一是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偏好会影响政策目标的选择;二是反映社会利益的“集体偏好”会使政策制定者达成某种共识;三是—般政策原则会对经济政策目标产生“非经济”影响。^[2] Chu 根据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在 1970—1980 年间采取差异性较大的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得出两方面影响产业政策制定的因素,一是政府决策机构的意识形态及组织凝聚性、决策系统的集中性以及所拥有的各种政策工具;二是政府官僚系统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网络的关联特性。^[17] 韩小明(2001)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背景,分析了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动机对产业政策制定时的影响。^[3] 张泽一等(2008)从产业政策无效的理论逻辑视角逆向分析了影响产业政策的相关因素。首先,在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既有可能是政策主体缺乏制定合理产业

政策的愿望,又有可能是缺乏完全的知识和信息。政策制定主体能力和制定程序的约束也对产业政策有一定的影响。^[13]

另一方面,以产业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为着力点。美国政策学专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研究政策执行过程所建立的模型,认为可以把政策执行过程视为一种赛局(game),包括竞赛者(政策执行人员和相关人员)、利害关系、竞赛资源、竞赛规则、策略与技术等。政策执行能否

收稿日期:2011-02-15; 修订日期:2012-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09&ZD054)子课题(09&ZD05405)。

作者简介:杨京钟(1974-),男,湖北京山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体育产业政策, E-mail: yhxjz@163.com; 吕庆华(1960-),男,福建寿宁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理论及营运; 易剑东(1969-),男,江西丰城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与产业、体育文化与传播; 朱苗(1986-),女,湖北荆州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

作者单位:1. 黎明职业大学 经济贸易系,福建 泉州 362000; 2. 华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3.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 南昌 330013

1. 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3. Jiang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成功,取决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之间动态的策略选择。^[15]国内学者吴昌南(2003)利用博弈论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关系进行分析。^[6]李汶纪(2003)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产业政策在形成与执行过程中,决策传统和政策的理念取向、决策结构的集权化程度和凝聚性程度起着重要作用。张泽一(2009)认为产业政策的执行实施还会受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企业行为和能力、社会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从企业能力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产业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是影响政策的因素之一,能力构建导向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12]

综上所述,学术界针对体育用品产业领域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研究,规范性的实证研究甚少,更鲜见以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政策实施两个视角作用于产业政策效率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数据模型定量实证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数量统计研究方法,使用理论分析框架,借用数理统计工具研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弥补理论界这一缺失,丰富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内容。

2 研究变量的影响因素及研究假设

本文的概念模型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分为10个方面,用以说明我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由此可作出如下研究假设:

2.1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众所周知,构成政策主体的基本单位是人,他们站在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机会,可能制定缺乏合理产业政策的愿望。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制定的政策应符合“经济人”假设,也是有理性即关心个人利益、按个人的诱因行事、从个人角度看待问题并按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对比来行动的,具有社会和自身的二元利益动机。^[1]尤其在一个以维护整体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框架中,政策主体极可能钻政策“真空”的空子,制定一些貌似合理而事实有失公允的政策,进行政策“寻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若缺乏激励和约束,会在反映客观经济趋势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政策目标等方面产生偏离^[13]。此外,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习惯于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具有明显的部门特色,致使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为追逐各自的利益有时也发生相互冲突或矛盾。

研究假设1: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越偏向产业的整体利益,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2.2 决策主体的能力

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决策过程。决策主体通过收集大量信息对产业、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有意愿、有能力整合一切相关资源,并用科学的方法加

以处理,才能达到让制定的产业政策反映客观实际、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从各种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合理满意的方案。

研究假设2:决策主体的能力越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2.3 外部环境

首先,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外部背景,国家产业政策制定越来越受制于全球经济化因素。其次,国家及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与水平对产业政策有客观强制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力度。第三,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会影响国家相关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因而跨国公司战略也影响着产业政策制定的方向。第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度安排、决策传统和政策理念也限制着决策者的思想范围,并且反映着决策者的习惯和偏好,^[14]决定着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效率。

研究假设3:外部环境越有利于体育用品产业发展,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2.4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劳动成本优势减弱。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是0.68美元/小时,而印度纺织工人的平均工资是0.38美元/小时,可见,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在逐渐减弱。二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以制造、加工为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调查显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有60%~70%的企业为国外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只能赚取10%左右的薄利加工费。而90%以上的利润被国外品牌商、渠道商和零售商掌握。^[10]三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外贸依存度大,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依存度高达60%。^[5]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会导致产能过剩与贸易保护问题。四是,体育用品产业的生产区域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5省(市),集中度超过了85%。由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呈现一定的产业集群优势,而负效应在于老工业区的衰退和区域经济的演进。

研究假设4:体育用品产业政策越具针对性,其效率越高。

2.5 体育用品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一方面,体育用品产业上游生产要素的表现和能力能较好地为体育用品企业提供最低成本的投入,而支持产业对资源和技术的支持可促进信息在产业间的传递,加快产业创新。另一方面,中国体育用品消费需求旺盛。截至2008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从2001年的1.3亿增加到5亿,若城市人口收入每增加1%,它的体育消费就增加1.5%。^[4]这刺激了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消费者的体育用品消费,这是中国体育用品产业链所具有的独特竞争优势。

研究假设5:产业链相关产业发展越好,体育用品产业

政策效率越高。

2.6 政策本身的有效性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自身须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和持续性。若产业政策没有顺应市场规律,不考虑企业的利益取向,不仅难以有效执行,而且要付出较大成本,反而阻碍产业的发展。而且,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其手段(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法律、信息、行政手段等)的运用。政策手段及其组合是否与所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相匹配,应依据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目标等因素选择合适的产业政策手段,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6] 否则产业政策目标就易落空。

研究假设 6:政策本身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2.7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受产业政策影响最大的主体。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行为自主性的增加、政府职能的转变,决策主体与运作主体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履行契约关系要求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建立起权责对等的规范性传导方式,最终产业政策的实现取决于企业的能力与反应,这决定着政策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企业要使政策给其带来的机会或者规避政策带来的风险,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力、财力、信息和政治优势,从而提高与政府的议价能力,争取对产业政策的制定有较大的影响力。

研究假设 7:体育用品企业的能力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2.8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有效,涉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的行为动机、传导手段、传导的层级等诸多因素,而最终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在产业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企业既是运作主体又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市场主体的经营方式和利益取向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企业会对同一政策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产业政策本身与企业的既定战略和目标相吻合,那么,企业会更加主动、更有动力去贯彻执行政策。反之,执行效果则大打折扣。

研究假设 8: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2.9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一方面,行业协会由于其非营利性质,在行业内具有权威性、公正性、独立性,可以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独立充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间人,监督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实施。另一方面,社会公众是体育用品产业潜在和现实的客户群体,因而社会公众有效而完善的舆论监督,能够实行外部督促与体育用品相关产业利益主体政策的有效落实,从而贯彻体育用品产业政策。

研究假设 9: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的力度越强,产业

政策的效率越高。

2.10 政府的利益博弈

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经济综合部门、宏观调控部门、专业部门,这些调控主体之间既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亦存在利益的冲突性。因而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博弈行为。由于我国五级政府在一定制度框架下政策主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利益动机。这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中测算可能的损益并实施相应的博弈行为,形成各自的利益博弈。

研究假设 10:政府利益博弈越有利于产业整体利益,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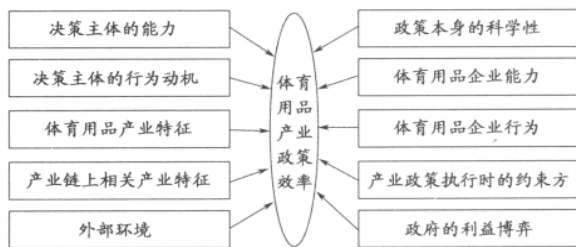


图 1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框架图

3 数据收集

3.1 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涉及 10 个政策因素变量及 31 个解释变量。主要包括:1)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因素(含决策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不同政府部门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 2 个解释变量);2)决策主体的能力因素(含决策主体收集处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决策主体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意见与建议,决策主体的认知水平 4 个解释变量);3)外部环境因素(含全球经济形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战略目标,跨国公司战略的导向性作用和决策者的政策理念及制度安排 4 个解释变量);4)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因素(含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技术“低端锁定”存在,出口依存度较高生产能力过剩,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效应低和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现象明显 5 个解释变量);5)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因素(含生产要素及相关支持产业发展现状和体育用品市场需求旺盛 2 个解释变量);6)政策本身有效性因素(含政策自身的合理性、可行性、持续性,产业政策所采取手段的针对性,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 3 个解释变量);7)体育用品企业能力因素(含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力,企业消化产业政策的能力和企业的议价能力 3 个解释变量);8)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因素(含行业协会对政策落实发挥的作用、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和舆论界对政策的监督力度 3 个解释变量);9)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因素(含企业应对产业政策的认同度,企业对信息的接受和反应速度与企业

经营目标、战略及政策导向的稳合性 3 个解释变量);10)政府的利益博弈因素(含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博弈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 2 个解释变量)。

3.2 样本说明

本研究样本来自笔者 2010 年在福建省泉州市所作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关键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福建泉州是我国体育用品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产业集聚区之一,是我国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有体育用品企业 4 000 余家,体育用品产业发达。占据国内 80% 的市场份额,已成为世界运动鞋等体育用品的主要制造基地。因而在泉州实施问卷调查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鉴于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政策的认同度、接受性及其具体实施,涉及体育用品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的具

体实施者(体育用品企业)两部分所产生的政策影响因素。因此,在实际问卷中,调查对象以泉州的体育用品企业为主,约占调查总数的 75%。同时,问卷的被调查者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和体育官员。如包括泉州市、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泉州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等政府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局、体育局、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学会(协会)、经济局、贸易局、外经委和外经局等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行政主管部门,此部分占调查总数的 25%。因此,我们选取规模以上体育用品企业 614 家和泉州各级政府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关的体育部门和产业经济主管部门 72 位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实际回收问卷 636 份,由于部分问卷为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17 份,有效回收率 97%。从问卷描述性内容看,构建了包括 10 个因素变量指标和 31 个解释变量在内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指标体系。问卷采用 Likert 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测量,并在问卷设计中采取五级 Likert

量表,选择“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比较不重要”、“非常不重要”5 种,分别计分为 5、4、3、2、1 分。由于 Likert 量表是现代调查问卷中普遍采用的度量方式,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Rensis A. Likert 于 1932 年在原有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是一种测量态度的方法。对于应采用几点量表法,学者 Berdie(1994)根据研究经验,综合提出以下看法:大多数情况下,五点量表是最可靠的,选项超过五点,一般人难有足够的辨别力。三点量表限制了温和意见与强烈意见的表达,五点量表则正好可以表示温和意见与强烈意见之间的区别。^[9]

4 数据分析

本研究对调研数据采用效度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同时运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规范实证评析,以期获得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关键因素,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有效执行实施提供决策参考建议。

4.1 数据质量

4.1.1 效度检验

因子分析是检验结构效度最常用的方法,以因子分析去检验问卷的效度,并有效地抽取共同因素,则此共同因素与理论结构的心理特质非常接近,可以说此问卷或量表具有建构效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对问卷的理论构思效度进行验证,检验了数据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和维度效度。内容效度是用于检验是否有足够且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度量所属概念。建构效度是通过因子分析来检验结构效度,以测量出概念的程度或理论的特质;维度效度是验证前述所提出的 10 个研究假设。具体效度检验分析见表 1 内容。

表 1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研究假设的因子载荷分析一览表

研究假设变量指标	测量变量	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标准	分析结果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决策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0.683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2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目标不一致	0.585		
决策主体的能力	决策主体收集处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	0.807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4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决策主体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0.788		
	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0.583		
	决策主体的认知水平	0.614		
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形势	0.801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4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战略目标	0.656		
	决策者的理念及制度安排	0.533		
	跨国公司战略的导向性作用	0.526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	0.716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5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技术“低端锁定”局面一直存在	0.761		
	出口依存度较高,生产能力过剩	0.631		
	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效应低	0.540		
	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现象明显	0.815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体育用品市场需求旺盛	0.750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2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生产要素及相关支持产业发展态势	0.558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持续性	0.826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3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产业政策所采取手段的针对性	0.737		
	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	0.597		

研究假设变量指标	测量变量	因子载荷	因子载荷标准	分析结果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判断力	0.557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3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企业接受和消化产业政策的能力	0.680		
	企业拥有的权力与政府的议价能力	0.614		
体育用品企业的行为	企业应对产业政策的认同度	0.675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3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企业对信息的接受和反应速度	0.855		
	企业经营目标、战略与政策导向吻合性	0.697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行业协会对政策落实发挥的作用	0.669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3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	0.761		
	舆论界对政策的监督力度	0.587		
政府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博弈	0.724	特征根>1 因子载荷>0.5	维度正确,2 个可测量变量能够反映其因子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博弈	0.860		

综上所述,基于回收问卷的调查数据,验证了问卷效度的有效性。

4.1.2 信度检验

为提高整个度量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采用了数量不等的多个指标进行衡量。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alpha 参数法评价同一概念项的内部一致性,度量其是否符合一般的信度检验要求。信度是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系数越高,即表示测量的结果越一致、稳定。其公式为:

$$\alpha = \frac{k}{k+1} \left(1 - \frac{\sum_{i=1}^K \sigma_i^2}{\sigma_T^2} \right)$$

其中,K 代表量表中题项总数,σ_i² 是第 i 题项得分的题内方差,σ_T² 为总题项(总得分)的方差。若概念有多维,alpha 参数对每一维分别计算其信度。Tang (2000)认为,在探索性研究阶段,alpha 达到 0.6 即满足要求。^[16] 吴明隆认为这与研究目的和测验分数的运用有关,如研究者的目的在编制预测问卷或测量某构思的先导性研究,信度系数在 0.5~0.6 已足够。^[9] 因此,将信度标准设定为 α ≥ 0.6。各因素的 Cronbach's alpha 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因素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一览表

项目	Cronbach's alpha	参考标准
总量表可靠性	0.805	α ≥ 0.6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0.713	
决策主体的能力	0.739	
外部环境	0.627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0.766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0.674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0.675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0.638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0.633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0.651	
政府的利益博弈	0.746	

分析结果显示,表 2 中的所有因素变量的值均大于 0.6 的信度系数值,均符合本研究所设定的标准,表明测量的一致性程度较高,而且,体育用品产业特征的 Cronbach's alpha 值最高为 0.766,由此可见,数据具有较高的复合信度。

4.1.3 因子分析

鉴于因子分析能将众多假设变量进行深入分析,从样本数据中挖掘出潜在的因子信息,以此来测量构建的效率。故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 10 个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分析如下:KMO 样本测度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是检验指标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的两种方法,KMO 值越大,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做因子分析。学者 Kaiser (1974)认为,若 KMO < 0.5 时,较不适宜做因子分析。对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 10 个因素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从表 3 可知 KMO 值为 0.579,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Sig = 0.000,表明因素变量的相关矩阵存在共同因素,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3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一览表

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579
Approx. Chi-Square	961.282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df 465
Sig.	0.000

此外,经因子分析后,利用因子分析碎石图的帮助来确定 10 个影响因素的最优因子数量。在图 2 中,横坐标表示因子数目,纵坐标表示特征值。前 3 个特征值 > 1,即前 3 个因子对解释变量的贡献最大,并且在主成分分析过程中,一般提取出累计贡献率 ≥ 85% 的少数几个主成分,就可以代表原来多个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进行评价^[11],前 3 个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的 84.748%,因而提取前 3 个主成分作为代表原有 10 个指标的综合指标进行分析。各因素指标的主成分特征值及其贡献率见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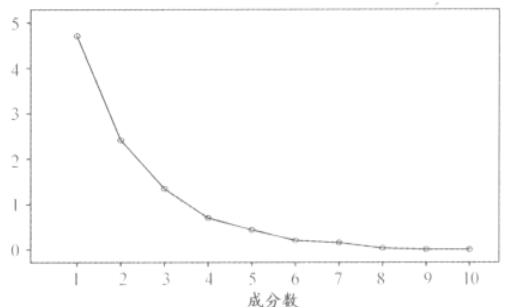


图 2 10 个影响因素因子分析碎石图

表 4 主成分特征值及其贡献率一览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总和	方差的%	累积 %
1	4.711	47.113	47.113
2	2.417	24.175	71.288
3	1.346	13.460	84.748
4	0.699	6.990	91.738
5	0.438	4.380	96.119
6	0.201	2.015	98.133
7	0.153	1.534	99.667
8	0.029	0.287	99.954
9	0.005	0.046	100.000
10	0	0	100.00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为明确主成分与各指标的相关程度,进行了主成分荷载分析,主成分荷载越高,则说明该主成分与该指标的相关度越高,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依据因子对应的各项目

表 5 转轴后的成分矩阵一览表

因子	影响因素项目	因子载荷		
		F ₁	F ₂	F ₃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0.865	0.847	-0.047
	决策主体的能力	0.824	0.746	-0.033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0.869	-0.026	0.803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0.660	-0.112	0.808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0.691	0.198	0.125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0.364	0.166	0.240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0.456	-0.181	-0.136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0.420	0.640	-0.148
	政府的利益博弈	0.882	0.697	0.350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0.566	0.594	-0.249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含 Kaiser 正态化的 Varimax 法。

的含义,将这 3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和外部环境。

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结果,产生新的研究构面,形成因子分析后新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4.2 回归分析的假设检验

从以上分析可知,各个因素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果存在显著的正线性相关,但这种关系是否就是因果关系,需经回归分析检验证明。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验证影响因素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因果关系。除了对变量的前后因果关系进行验证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不同因素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解释能力。现将各因素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图 3 的理论模型,由表 6 所示,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变量定义为模式 1;模式 2 在模式 1 的基础上加入体育用品产业实施变量;模式 3 在模式 2 的基础上加入外部环境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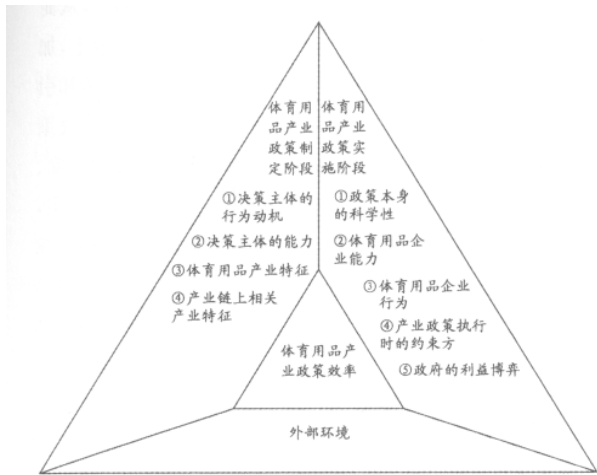


图 3 因子分析后的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理论模型图

在模式 1 中,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的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决策主体的能力、体育用品产业特征、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为自变量,体育用品产业政策为因变量,经过逐步筛选法,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标准回归系数 β 值为 0.752,且显著性检验值 $P < 0.01$,说明体育用品

产业特征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比较显著,假设 4 成立。模式 2 是在模式 1 的基础上增加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体育用品企业能力、体育用品企业行为、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政府的利益博弈等 5 个自变量,以体育用品产业政策为因变量。政策本身的科学性的标准回归系数 β 值为 0.521,且显著性检验值 $P < 0.01$ 。说明政策手段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即假设 6 成立。体育用品企业行为的标准回归系数 β 值为 0.421,且显著性检验值 $P < 0.01$ 。说明假设 8 的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此外,模式 3 比模式 2 的 R² 没有增加,表明新加入的变量不具有解释力,因而模式 3 中新加入的变量与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影响不显著,即假设 3 不成立。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具体结果见表 7。

由表 7 可知,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有效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有显著影响。其中,体育用品产业特征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影响最大,这涉及到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在制定时应如何有针对性

地做出,且涉及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表 6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变 量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回归系数 Beta	t	Sig.	回归系数 Beta	t	Sig.	回归系数 Beta	t	Sig.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									
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	-0.019	-0.170	0.872	-0.126	-0.799	0.002	0.063	0.402	0.091
决策主体的能力	-0.032	-0.300	0.776	-0.032	-0.200	0.248	-0.235	-1.459	0.234
体育用品产业特征	-0.119	-1.815	0.129	0.212	1.105	0.000	0.383	1.995	0.000
产业链上相关产业特征	-0.001	-0.028	0.979	0.211	1.372	0.494	0.441	2.871	0.000
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实施阶段									
政策本身的科学性				-0.348	-2.046	0.000	-0.347	-2.038	0.000
体育用品企业能力				0.230	1.281	0.062	0.473	2.630	0.000
体育用品企业行为				-0.264	-1.480	0.000	-0.409	-2.295	0.000
产业政策执行时的约束方				0.102	0.531	0.784	0.239	1.239	0.000
政府的利益博弈				-0.281	-1.653	0.408	-0.258	-1.449	0.300
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0.063	0.402	0.011
R ²						0.752	0.955	0.955	
调整后的 R ²	0.505			0.977			0.977		

表 7 理论假设验证结果一览表

理论假设	结果
研究假设 1:决策主体的行为动机越偏向产业的整体利益,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2:决策主体的能力越强,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3:外部环境越有利于体育用品产业发展,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4:体育用品产业特征越具针对性,其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5:产业链相关产业发展越好,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6:政策手段的有效性越高,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7:体育用品企业的能力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8:体育用品企业的执行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9:产业政策执行时约束方的力度越强,产业政策的效率越高。	×
研究假设 10:政府利益博弈越有利于产业整体利益,产业政策效率越高。	×

注:“√”表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影响显著,“×”表示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有影响,但不显著。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结论

依据提炼出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因素,提出本文的相关假设和理论研究模型。首先,通过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来保证问卷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三大类因素:体育用品产业政策制定阶段、体育用品产业实施阶段及外部环境系统,这与最初的理论构思相吻合。最后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验证,发现有 3 个假设成立,将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关键影响因素按其程度高低依次排列为: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的有效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依据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对如何提升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5.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体育用品产业特征、政策本身的有效性、体育用品企业行为被证明对体育用品产业政策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是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政策的关键因素,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成机制,保证产业政策持续发展的规范性和效率性,从而提升政策执行和实施手段的有效性。1)在财政政策上,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设立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用品产业的积极性;2)在税收政策上,构建以间接税收优惠(投资抵免、亏损结转、税项扣除、特别准备金、加速折旧、费用扣除、延期纳税等)政策为主,直接税收优惠(减税免税、税率优惠、以税还贷、税额扣除等)政策为辅,直接税收优惠与间接税收优惠政策紧密结合,规范、持久扶持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体系;3)在金融政策上,力图建立健全我国中小体育用品企业融资政策信用担保体系,优化和完善支持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筹融资政策;4)在法律政策上,政府应健全体育用品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制度,加强标准化和质量认证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和保护企业研发创新,为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 增强体育用品企业的微观经营行为。体育用品企业是政府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和执行者,政策实施效应的好坏取决于微观企业的执行主体行为。为此,鉴于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大多数以“家族式”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

业态,企业家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和动力。客观上迫切需要培育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的引领作用;政府引导与体育用品企业创新行为相结合,改善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培育体育用品龙头企业集团;打造特色化的区域性体育用品产业园区,促进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培育执行有效的体育用品中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联系政府、服务体育用品企业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及协调企业关系、矫正企业不良行为的行业自律作用,进而增强体育用品企业实施国家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微观执行力。

参考文献:

- [1]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88.
- [2] 丁伯根.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3] 韩小明.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J].教学与研究,2001,(7):20-26.
- [4] 江和平,张海潮.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5] 靳英华.论国际间产业转移与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结构调整[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6):1-3.
- [6] 廖长友,刘垂玖.浅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J].北方经贸,2004,(8):19-21.

- [7] 李玖纪.新制度主义理论与产业政策分析框架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3,(1):27-30.
- [8] 吴昌南.我国产业政策实施路径存在问题及其对策[J].当代财经,2003,(4):104-106.
- [9] 吴明隆.SPSS统计应用实务:问卷分析与应用统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10] 杨再惠.提高我国体育用品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J].体育科学,2005,25(8):16-20.
- [11] 张尧庭,方开泰.多元统计分析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 [12] 张泽一.产业政策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J].生产力研究,2009,(10):116-117.
- [13] 张泽一,赵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与述评[J].中国流通经济,2008,(7):28-30.
- [14] 赵英.中国产业政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5] DANIEL OKIMOTO.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 [16] TANG S M. An impact model of intranet adoption:an explorat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J]. J System Software,2000,51(3):157-173.
- [17] YUN-HAN CHU. Stat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of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J]. Int Org,1989,(43):647-672.

(上接第27页)

- [15] 姒刚彦.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4,28(3):58-62.
- [16] 王步标,华明.运动生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44,423-433.
- [17] 杨则宜.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8,27(3):397-399.
- [18] 殷恒婵.体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94-108.
- [19] 殷恒婵,傅雪林.对体育锻炼心理健康效应研究的分析与展望[J].体育科学,2004,24(6):37-39.
- [20] 殷恒婵,卢敏,王新利,等.运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7,27(5):41-46.
- [21] 张勇,王丽.对全国青少年学生1985-2000年体质状况的比较

- 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3,39(5):24-26.
- [22] 甄志平,张瑛秋,邢文华.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运动处方教学方式对中学生体质影响的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20(5):5~9.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EB/OL].http://www.gov.cn/jrzq/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2011.
- [2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Z].北京:中发7号,2007.
- [2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Z].北京:中发9号,1999.
- [26] 中国青少年研究网[EB/OL].<http://www.cycs.org/InsInfo.asp?InsID=1&ID=13818>.2011.